

案 卷 号	
总 登 记 号	
所属目录号	

项 目 编 号		密 级	保 管 期 限
案卷题名:		10 关于东北地下党回忆录	
编 制 单 位			
编 制 日 期			
共	卷 第	卷 共	页

地方党史資料

名称:

类别:

作者:

中共辽宁地方党史編委会办公室

資料目錄

总号	分类号	编号	性质	資料名称	年代	作者	資料来源	份数	永久	长期	備考
		86		“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领导运动的回忆。	1931	魏維凡	省編委	4			
		87		一九三三~一九三三年滿洲省委組織及活动情况。	“	李 实	“	“			
		88		关于哈尔滨学生运动等情况。	1930	鄧 魯风	黑龍江編委	“			
		89		关于吉东局的情况。	1931	孙广英	“	“			
		90		关于一九三三年北滿特委情况，滿洲省委迁到哈尔滨的情况。	“	侯 志	“	“			
		91		对中共滿洲省委的一段回忆。	“	尙 斌	省編委	1			
		92		一九三二~一九三七年党的在沈阳監獄的活动情况。	1932	王常泰	沈阳編委	“			
		93		一九三三年吉林党组织情况。	1933	陆 平	吉林編委	4			
		94		关于滿洲省委的一些情况。	“	钟子云	黑龍江編委	“			
		95		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哈尔滨CY情况。	“	罗 云	“				
		96		一二六指示信討論貫徹情况。	“	李耀奎	省編委	4			

97	一九二五~ 一九四五 年东北地方 党史情况。	1925.	李耀奎	旅大編委	4				
98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年滿洲省委 工作時情况。	1933.	宋兰韻	黑龙江 編委	"				
99	有关滿洲省 局和吉東 的情况。	1934.	张 林	"	"				
100	一九三六 年以前滿 洲省及哈 尔濱黨團 組織斗争 情况。	1932.	"	"	"				
101	东北党務特 别工作委员会 成立的組織 因经过及与 发展的关系。	1942.	张君平	省編委	"				
102	关于东北党 团的一些片 断。	1945.	董雨航	"	"				
103	馬英回忆录。	1931.	馬 英	吉林編委	2				
104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年中共滿 洲省委的 情况。	1934.	楊光華	省編委	4				
105	共产党員在 哈爾濱獄中 的斗争。	"	張曉岩	黑龙江 編委					
106	中共辽東支 部和辽盟工 作经过情况 介紹。	1942.	羅 衡	省編委	4				

107	一九三一～ 一九四五年党在 东北地下活动情 况。	1931·李振远	沈阳 編委	4				
108	一九三五～ 一九四五年党在东 北地区的活动情 况。	1935·丁 宜	省編委	"				
109	一九三七～ 一九四五年党在东 北的活动。	1937·李振远	"	"				
110	一九三四～ 一九四三年党在东 北地区的活动情 况。	1934·丁 宜	"	"				
111	一九三五～ 一九四五年党在东 北地区的活动情 况。	1935·	沈阳 編委	"				
112	一九三九～ 一九四〇年党在东 北地区活动情况。	1939·任 远	"	"				
113	一九四〇年在东 北一带的工作情 况。	1940·侯 洛	省編委	"				
114	一九四二～ 一九四五年党在东 北地区活动情况。	1942·楊超时	沈阳 編委	"				
115	一九四二～ 一九四五年晋察冀 分局东北工作委 员会往东北派干 部及其工作情况。	· 吕健东	本溪 編委					
116	一九四二～ 一九四五年党在东 北地区活动情况。	· 赵濯华	沈阳 編委	4				

“九一八”事变前后党在东北领导革命运动的回忆

——魏 維 凡

我會經到东北工作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間，党中央派我巡視东北党的工作，時間很短，来去約半个多月的時間。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党中央派我到东北担任滿洲省委組織部长，并代理滿洲省委書記，直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奉中央命令，調我回上海工作为止。这两段時間，恰值“九一八”事变前后，有关党在这个时期领导东北人民进行革命运动若干較為重大的問題，提出来談談，供参考。

因为時間太久，个人水平太低，所談問題，不确切，不詳尽，乃至很多錯誤的地方，在所难免，希望予以教正。

一、第一次到东北

一九三一年党的四中全会后，約在四月初，党中央派我到东北去檢查滿洲省委糾正立三路線轉變的情况，并傳達中央关于紅五月工作的決定。

当时滿洲省委書記是張应龙，安徽人，是一个工人全志。組織部长兼宣傳部长是何成湘全志，職工运动委员会書記是馬兴繁（是一个铁路工人）。秘書长、团省委書記是什么人，我記不起来了。

这次到东北所了解的滿洲省委领导下的党組織，据我現在还能記得起来的大致情况是：北滿、东滿設有特委組織，南滿沒有設置特委。大連有市委組織，市委書記是董昌繁（后为王亚堂）。海龙設有中心县委組織。鞍山、本溪的党組織情况如何？目前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撫順的情况，据我記得的，日本特务在那里統治很严，省委派去的工作全志，很不容易在那里立足。往往派去的工作全志呆不多久，即被捕，因而組織不易建立。沈阳在那个时候沒有市委組織，只有区委领导各支部进行革命活动。是一个区委还是两个区委組織，也記不清了。区委是在省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沈阳的基層組織，那个时候比較强大的支部是沈阳兵工厂的党支部。

黨員有三、四十人之多。沈陽兵工廠是當時東北最大的軍事工業，共有十三個分廠，工人約三萬左右。工人的鬥爭也比較多，支部在工人羣眾中還能起領導作用。曾在手工業工人里面，皮鞋作坊有黨的支部。此外，黨在知識分子羣眾中，有幾個中學有黨的支部，一個福音堂的教會中學有黨的支部，東北大學里也有黨的支部。

當時團的組織情況如何，我記不得了。

羣眾組織方面，沈陽、大連、哈爾濱和南滿鐵路、中東鐵路都有赤色工會組織，工會會員數目都不多，只是比黨員的數目字稍大一些，未能形成羣眾性的工人組織。反帝大全盟，凡是有黨的活動的地方，都有這樣組織。加入反帝大全盟的人數，比較多些，組織也比較廣泛些。反日會的組織，在這個時候還沒有。

總之，這個時期的黨組織力量是不大的，而羣眾組織的力量也不夠那麼廣泛和健強。

儘管如此，但黨在東北羣眾中的影響是很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民族、民主解放的革命，只有共產黨領導人民英勇奮鬥，前仆後起的奮勇前進。這在先進的羣眾中都能予以肯定。^{能夠}

問題是那個時候擺在東北黨和人民面前的是強大而又特別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東北的封建地主擁有土地數量之大和武裝之多，在全國是突出的。加上東北的黨執行了一個短時期的立三路線，緊接着若干羅章龍右派在黨的基礎和羣眾中也散布了一些壞的影響，因此，當我到達沈陽和滿洲省委接上頭所了解的情況，原來滿洲省委書記陳厚秋全志被捕只幾個月（陳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到東北，約在冬季被捕），新的省委書記張應龍到職不久，有些地方黨組織還未來得及聯系上，所以整個組織情況還不能了解得全面、具體。又因為一九三一年的四月間，九一八事變只是五個月的時間，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發動事變，占領東北，首先要對堅決反對它的共產黨進行

破坏，大力镇压。所以南满党的组织和赤色群众组织遭到一些破坏。陈潭秋、全志的被捕，就是最显明不过的例子。以后张应龙全志又被捕，更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独占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目的必须采取各种办法来镇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以期扑灭坚决彻底打倒它的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代表立三路线的新的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案发布以后，满洲省委是坚决执行了的。当时党、团、工会组织都曾合而为一，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响应全国总暴动的号召。暴动在东北没有搞起来，只是搞了些罢工、罢课、罢市的鼓动工作，进行了一些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活动。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好。敌人压迫、破坏加紧了，基层党员认为空喊暴动，不看主客观条件，不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不依靠群众的力量，而只是少数的先锋队 and 少数先进群众进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组织破坏，全志们被捕，因而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产生了畏缩和消极情绪，以致支部会就不易召开。

四中全会后，罗章龙右派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范围虽说不大，但也给基层党组织以不良影响。经省委和罗章龙右派和唐安经等进行斗争，并采取组织隔离办法进行教育，划清界限，使唐安经们分裂党的企图没有得逞。最后，把不可救药的唐安经等四、五个人开除出党，才结束了这一场严重斗争。

四中全会后，满洲省委在纠正立三路线方面有两个转变：一个是组织上的转变，即取消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系统；一个是政治上的转变，即在大城市不再进行武装暴动的口号。但是，这个转变很不彻底的。在领导思想方面没有划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党的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的界限，不懂得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立三路线，却又出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在满洲省委传达中央红五月工作决定，参加省委会所布置的纪念红五月的工作时，仍然不是从东北实际情况出发，抓住东北的特点布置工作，依旧还是空喊罢工

、罢課、遊行示威等口号，来代替艰苦的群众工作。特别未能突出地抓紧广泛群众的反日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深入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和群众切身要求紧密结合起来，领导他们走向反日斗争的道路。显然，这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一九三一年四月間，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整个东北的形势，已经大体上可以看出来了。首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完成；中国工农红军一再打破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高潮正在形成；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已经取得开辟青岛海港的特权，将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掠夺上受到严重的挫败，奉系军阀也将会逐渐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倒向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把日本帝国主义拖入危机的泥坑。而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并达到独霸东亚、称霸世界的目的，便以国际帝国主义在东方亮兵的任务自任，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以先占领东北作为进攻苏联的步骤，来缓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其实际则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先占满蒙，后占全中国，称霸世界的既定国策，借以挽救它难以摆脱的政治、经济危机。所以，这个时期日本浪人在东北到处挑拨，制造种种侵占东北进攻中国的借口。而日本帝国主义驻东北的关东军，正在不断增加，调动频繁。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朕兆，已经是“箭在弦上，盘马弯弓”的形势了。东北人民，特别是南满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各种压迫下，早已蕴蓄着熊熊的反日怒火，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这种形势，在省委交换意见时，省委全志们都是这样的看法，面上海向中央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上都分析了几种情况，中央负责全志也肯定这种看法（当时代表向中央接受汇报的

怎么办？我们仍然在这种即将到来的大事变前夜面前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个人却未能提出任何办法来。相反，在我传达红五月工作决定和布置红五月工作方面，都未能突出的抓住反日这个中心问题来着重布置各项工作。显然，我个人还是被严重的“左”倾机会思想所支配，根本不懂得从实际出发来处理实际问题。从这里，使我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的指导是如何重要！而我在当时根本不了解毛主席的任何东西。

二 第二次到东北

一九三二年我第二次到东北时，东北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整个东北的各主要城市，已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溥仪从关里弄到长春，建立了所谓满洲国，溥仪已经傀儡登场，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国民党坚持不抵抗主义的政策，把整个东北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已被国民党出卖和镇压下去了。但全国人民在党的反日号召下，在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阶层、抗日武装，坚决抗日的推动和影响下，反日火焰正在燃烧。而在东北的各阶层人民，已经风起云涌，掀起汹涌澎湃的武装反日的浪潮。各地方举起了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许多所谓“红胡子”，建立了各种各色的山林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沈阳兵工厂的工人，成批地参加抗日义勇军，不少地方的工人纷纷加入抗日义勇军。农民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武装斗争中的，更是不在少数。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工农、知识份子、中小商人，在关外难以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络绎不绝地走向关内。在北平的东北流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不少回到东北参加武装抗日斗争；还有些偷偷地奔向苏联去找出路，其目的都为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挽救国家民族的惨祸。撤退到中东路沿线 散布在东满一带的原东北军，李杜、丁超、苏炳文、王德林的部队也还打着反日的旗帜。而国民党的马占山、邓铁梅等，都在大搞义勇军的活动。各方面的反日武

裝，各種名目的反日組織，都在爭取群眾，擴大勢力。但也都都在反日過程中經受考驗。誰是真抗日，誰是借抗日之名，却在“搖羊頭，賣狗肉”，都將在抗日的洪河中經受考驗。

“九一八”事變後，我們的黨在東北，從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在海龍中心縣委領導下，建立了紅軍三十二軍游擊隊，不斷給南滿日偽以各種打擊。在北滿黨領導了巴彥的抗日游擊隊，經常在松花江附近活動，出沒自如，不斷奪取日偽武裝，武裝壯大自己的隊伍。在東滿，黨的將委十分重視抗日武裝工作，將委書記老孫全志（名字記不得了）、周保中全志等都會經直接組織撤退到東滿的原東北軍李杜、丁超、蘇炳文、王德林的部隊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爭取他們以現有軍人的力量，依靠東滿人民，堅持武裝抗日鬥爭，並和王德林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只是因為李杜、丁超、蘇炳文們重閱思想牢不可破，受反共思想支配，而不採納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還想保持他們的實力，結果終於慘敗。同時，東滿的黨並沒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東北軍方面，放棄在抗日人民方面組織抗日武裝。東滿的黨，在延吉中心縣委直接領導下，建立了以朝鮮族為基礎的抗日游擊隊，成為東滿人民抗日的骨幹力量。

這個時期，東北的黨，為了把東北人民組織到抗日隊伍中來，各級黨委，各個地方的黨組織，都會經在工、農和知識分子群眾里面，建立了反日會的組織。對反日會會員經常進行反日宣傳教育工作，組織與領導他們進行反日鬥爭。

黨在這個時期內，假使路線正確，戰略策略以及政策對頭的話，我們黨的力量是小的。抓緊東北各階層人民的反日高潮，正確的建立強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星星之火是可以成為燎原之勢的。日本佔領東北以後，那個不感到國破家亡的災難，生死存亡，擺在每個不願當亡國奴的人的面前。不僅各階級、各階層的人都在嚴肅、緊張地對待這個問題，就是当了漢奸的偽滿洲國的軍政人員，在日本人嚴密控制與奴

役下，也难安于位。其中若干人也表示苦悶、徬徨，甚而動搖，象哈爾濱的偽警各司令于大頭这样的人，也常發牢騷，不滿日本帝國主義對他的監視和控制。

可是我們東北的任務是去堅決執行北方會議反對滿洲特殊論的。

滿洲是否有其特殊的地方呢？就全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講，就中國當在當時民族、民主革命任務講，當然滿洲不應有什麼特殊。但東北在全國範圍內，確有它不少特殊的地方。“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已經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的殖民地，在關內國民黨統治區還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的半殖民地，這是一。第二，關內人民曾經經過了第一次大革命風暴的鍛煉，階級關係有很顯著的變化，在東北只是把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幟換成了所謂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東北沒有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所以階級分化不是那麼顯著，東北人民也缺乏第一次大革命的經驗。第三，國民黨在東北只是在上層掛了幾塊招牌，廣大人民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東西，而東北軍閥的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封鎖割據特別強，關外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王國。國民黨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不能在東北流通，人民只使用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發行的紙幣。東北與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國土緊密相連，從大興安嶺到烏蘇里江，從滿洲里到額爾齊斯河，綿延數千里的中蘇國界，緊緊接壤。漫長的中東鐵路，伸展在東北境內的北滿和東滿，中東路沿綫，居住了蘇聯很多的僑民，僅哈爾濱一個城市，就有蘇聯僑民六萬多人（約七萬多沒有蘇聯國籍的白俄不計算在內）。哈爾濱和中東鐵路沿綫的中國人很多，都會講幾句俄國話，可以全蘇聯僑民直接談一些日常生活的話。在蘇聯近東地區，約有一百多萬華僑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這些華僑大部分和東北人民有親朋鄉黨關係，經常來來往往。所有這些情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地位，經濟生活方面的大為提高

等等，都直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鼓舞着东北人民。尤其是中东铁路的职工，中苏筑路员工全在一起生活着、工作着，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以上这些情况，不是东北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呢？主观主义的

“左”倾机会主义，闭着眼睛不看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因此，也就不可能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来发展革命力量。而我正是接受了主观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到东北去执行这一个错误的路线，坚决贯彻反对满洲特殊论。

一九三二年夏，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是由博古、洛甫、李竹生等主持的。何成湘全志代表满洲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在会议上，何成湘全志在发言中讲了些满洲地区的特殊情况，讲到东北已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党的力量小，群众组织不广泛，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立了满洲国等等。博古全志组织力量，严予驳斥。在作结论时，博古全志完全抹煞了东北的特点，错误地认为：“关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伪满全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东北党的任务便规定为：大力发展红军三十二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罢工、罢课运动等，完全是一套“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我到东北就是去执行北方会议的决议，坚决反对满洲省委的满洲特殊论的。根据博古全志的指示，我去满洲省委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書記已经决定派华岗去，华岗未去以前由我暂代省委書記。撤消罗登贤全志的省委書記，调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撤消何成湘全志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留满洲省委担任宣传部长。并决定我到满洲省委后，组织新的省委，迅速召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会议的决议，纠正满洲特殊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传达报告是我作的，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我写的。从会议上，可以了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而我正是忠实贯彻执行北方会议的决议的。当时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除我、何成

湘、罗登賢、鮑國而外，还有楊靖宇（当时化名張貫一）、楊德麟（又名里場，現名楊一農）、李澤民、詹大奎、馮仲云、白楊（原姓金，滿族，南滿鐵路青年工人）、珠河中心县委書記老趙（朝鮮人，名字不記得了）、南滿是由王死堂參加的，东滿省委沒有关系上，无代表參加。省委秘書長老韓（即尚絅），因为鬧糾紛，我刚到滿洲省委，即為前省委停止職務，所以也沒有參加會議。會議在討論發誓時，大家檢查了路線和各种工作，通過了省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和新的省委的組成人員的名单，沒有什麼爭論，也沒有形成鬥爭難關局面。当时誰也沒有能夠理解這是“左”傾机会主義路線的繼續和發展。原因可能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第三次“左”傾机会主義者在當時中央已經形成政治上的聲勢和組織上的優勢，加以“右傾机会主義”的大帽子，予以“殘酷鬥爭”，或“无情打击”，而不敢提出異議，只是服從組織決定。另一方面，党内馬列主義水平低，為“左”傾教條主義吓虎住了，因而提不出異議來。

机会主義的政治路線，往往反映到組織上勢必形成宗派主義。第三次“左”傾机会主義路線在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是十分严重的。改組省委（就是所謂改造領導機構），撤消羅登賢同志省委書記的職務，就是最明白的例子。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張應龍同志被捕，羅登賢同志到滿洲担任省委書記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特務大肆鎮壓捕反日分子，瘋狂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時期。省委在沈陽不能立足，遷移到哈爾濱，在極端困難和白色恐怖下，建立起省委機關，重振旗鼓。堅持黨的反日鬥爭的領導，已經是很難得的了！羅登賢同志在担任滿洲省委書記時期，領導東北黨的工作做出了不容抹煞的成績。最显著的有兩方面：第一，抓緊了抗日武裝工作，建立了南滿的紅軍三十二軍游擊隊，取得了北滿巴彥的抗日游擊隊的領導權。而東滿開島的抗日武裝游擊隊，也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這些抗日武裝隊伍的建立，不論其力量大小，但在東北人民處在國破家亡、生死

存亡的大難時刻，舉起了我們黨的武裝抗日的大旗，指出了東北人民如何爭取民族解放的道路。給東北人民以無限的鼓舞。值得指出的，巴彥抗日游擊隊的成立，打破了我黨在東北建立抗日武裝的關門主義，而與黨外人士合作組織武裝抗日隊伍取得了成功的經驗。巴彥游擊隊的成立是經過巴彥的一個地主的兒子張甲，在北平朝陽大學當學生。“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抗日，從北平回到哈爾濱，找共產黨組織抗日隊伍，黨派趙尚志同志去擔任領導工作，彼此合作得很好，游擊隊伍不斷擴大。第二，建立了群眾性的反日會的組織，沖破了黃色群眾組織象第二黨的框子，團結了不少東北人民走向有組織的反日道路。正因為有這些成績，所以羅登賢同志在所有幹部和有組織的群眾中的威信是相當高的。羅登賢同志是一個久經革命鍛煉的工人同志，具有頑強對敵鬥爭的革命精神，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在東北已經工作了大半年之久，對東北各方面的情況已經比較熟悉了。撤銷他省委書記的職務，對滿洲黨的工作是一個損失。顯然，這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在組織路線上的宗派主義所犯的嚴重錯誤之一。

三、關於東北黨的組織狀況和領導群眾反日鬥爭的概況

省委擴大會議開過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決議也通過了，並向有聯繫的各級黨組織做了傳達，新的省委正式開始工作。

新的省委是由我擔任組織部長兼代省委書記（原決定華崗來擔任省委書記，但遲遲不見前來，約在冬季，才得到中央的通知，華崗路過青島被捕，我代理省委書記，直到關國上海時為止。我離開東北後由李耀奎擔任省委書記，後由羅良擔任省委書記；何成濬任宣傳部長，鮑圖（即徐寶鐸任共青团省委書記，後為劉明夫，李澤民（朝鮮族同志，懂六國文字，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品質很好，一九三三年夏在哈爾濱為日本逮捕後犧牲）任少數民族運動委員會的書記，詹大奎代理黨委。

楊明（湖北人，名字不記得）任秘書長，老曹（名字不記得了），是一黨全志的愛人，鐵路工人全志，曾經代表中國工會出席赤色職工國際會議）任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參加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的有白楊全志、王亞堂全志，左翼作家戴平萬全志），老季（號化名季密，真姓名記不起来了，是从苏联學軍事回来的全志，浙江省，學生出身）任軍事運動委員會書記。老罗、老曹、老季、刘明夫都在省委擴大會議以後派來的，所以未參加擴大會議。白楊、楊靖宇、王亞堂、楊德如都是省委委員。

當時擺在新的省委面前的中心任務是如何貫徹執行省委擴大會議的決議，而要貫徹執行這一決議，必須依靠黨的組織，特別是要依靠黨的战斗堡壘——支部，要依靠黨員的積極性及其昂揚的斗争意志。但在這個時候的實際情況，却給了我們硬釘子。東滿特委沒有聯繫上，南滿的黨組，“九一八”事變前後，從省委到支部連續遭到破壞，負責全志遭到逮捕，有些全志不能立足，不能不離開沈陽。省委遷往哈爾濱前後，沈陽的黨組織，事實上陷于癱瘓狀態。沈陽兵工廠黨支部的一些全志，“九一八”事變後，失去黨的領導，自動走到義勇軍去拿起武器進行武裝抗日（很可惜，我們始終沒有和這些全志聯繫上）。大連黨的組織，市委的名義還存在但只個別全志負責，支部很少，黨員數量有限。日本帝國主義對大連各方面的統治是特別嚴峻的，南滿鐵路大廠黨支部，始終只有六個黨員，既不能在群眾中活動，也不能發展。而大連沙河口那麼個地方，經常就有二千多專職特務遍布在工人居住區。南滿只有海龍中心县委（後改為盤石中心县委）和省委有聯繫。北滿也只有珠河中心县委和哈長鐵（即中東鐵路由哈爾濱到長春的支綫）沿阿城地方的黨組織有密切聯繫，中東路綫上的安達黨組織有聯繫，和松花江流域的湯原縣黨組織有聯繫，再就是哈爾濱市委和省委有密切關係。市委書記是楊